

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实践 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启示*

时胜勋

摘要 在文学理论研究遭遇危机之际,作为一个替代方案,文学批评在今天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使命。它能拯救理论吗?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对文学批评做出新的分析。文学批评是一种话语实践。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态表现为学院派批评和大众媒介批评两种,它们背后都有潜在的价值诉求,即本体价值诉求与功能价值诉求。二者从顶层上设计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机制,即介入写作与介入社会。作为这一话语机制的落实,文学批评的物质性力量、社会学力量、人文学力量,各尽其职,由此完成文学批评话语实践的整体进程。通过这一复杂的文学批评话语实践,文学批评成为“活的”“有力的”文学批评。就此而言,用批评拯救理论并非不现实。文论或可借由这一话语实践观照自身的危机,反躬自省,实现理论自我救赎。

关键词 当代文学批评;文论危机;话语实践;话语机制;拯救理论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9)01-0134-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9.01.017

作者简介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871

今天的中国文论遭遇多重危机。哲学层面有之,文论成为哲学的翻版;政治层面有之,文论成为政治政策的回响;文化层面有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承认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中国性,西方不承认现当代中国文论的原创性;文学层面有之,当代文学创作不屑于文学理论。其中,文学层面的非议最大。文学理论经常被认为远离文学、不接地气^①,在此困境下,作为一个替代的方案,文学批评承担了文学研究的及物、接地气的时代使命。虽然人们对文学批评始终寄予厚望,但这是一种非常矛盾复杂的状态。^②因为从文学批评角度而言,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包括最当下的今天。^③更甚者在于,有些文学批评者认为,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对文学批评的问题做出说明,无需理论介入。可是,文学批评果真不需要理论的观照?理论的观照是一种外行干涉还是意味着某种他者救赎?这的确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

文学批评不只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话语实践,亦即文学批评是活的、能动的,有着极其复杂的要素。因此,首先要厘定的就是它的话语形态,即整体上表现出来的文学批评的知识状态。

在欧美学术界,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的“界定、分类、分析、解释和评价”,^④或者是对文学的“描述、研究、分析、解释、评价”。^⑤文学批评的前提是阅读,基本工作是描述、分析、阐释,目标是评价和导向。评价和导向难度较大,需要从写作者整体和文学史角度甚至未来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判断。^⑥文学批评一般划分为实践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文学批评。前者是应用的文学批评,是针对具体写作者、文本而言的,后者与文学理论近似。“二战”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文学理论率先学科化,各类批评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当代艺术话语范式研究”(15BA011)的阶段性成果。

论也进入文学理论体系。在近现代西方都是只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的。晚近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各种理论化的文学批评以及所谓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等)。这一点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所不同。那么,今天的文学界存在怎样的文学批评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理论的文学批评的纯粹理论化,已经和文学批评无关了。从学科建制而言,今天的中国文论属于苏联时期“文艺学”(哲学—政治)模式,而非欧美“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模式。中西当代文论的对抗,根本上就是以苏联“文艺学”模式对抗欧美“文学批评”模式(包括其后引申的“文化理论”模式)。

其实,回望中国文学思想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注重诗文评,有着强大的诗评传统,其借由对文学文本的具体批评来阐述文学观念,提炼文学经验,总结文学规律,促进文学发展。到了近现代,这种基于文学自身的自发的诗评传统受到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而逐渐式微,它先被专业的、科学的、西方化的文学批评所取代。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又遭遇苏联的“文艺学”模式而失去活力,沦为政治化批评。与此同时,“文艺学”成为学科核心。新时期以来,得改革开放的东方,借助于欧风美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均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在获得巨大的文学效应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的学科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化、全球化浪潮使得文学理论全面西方化,介入文学弱化。文学批评全面理论化,文学的敏感度不够。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学院派理论(学科文论)与学院派批评。不过要说明的是,两种批评模式只是一种划分,并不排除其他划分。^⑦

学院派批评的特点之一是批评机制的专业性。他们的批评保持了学术的专业性,采用论文、专著等形式,使用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理论,不适宜一般人阅读。但是专业性又使得他们对文学的关注较为隔膜,感悟与审美体验不足,他们熟悉更多的来自国外的诸种批评理论,其批评处于某种“理论过剩”状态,也未必熟悉更多的文学实际,往往不接地气。^⑧此外,学院派的专业性还进一步体制化,今日尤甚,甚至“在新的批评‘行话’中鼾睡”,“‘文学批评’被‘高等院校’所垄断,就差不多进入完全休眠”。^⑨学院派批评实现了利益的共享与知识及主体再生产,导致的问题被概括为“自由、独立的批评精神的丧失”,“独立的艺术观念、艺术立场的缺失”。^⑩特点之二是批评对象的特定性。学院派多关注一些重要的写作者(名家)、文学文本以及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和趋势。学院派批评的最大优势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进行批评,看文学实践渊源如何,创新如何,有着怎样的潜力和方向等。此外,那些有潜力的文学新人以及新的文学现象,学

院派也给予充分的关注。上述两点就决定了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实践中,有很多文学并不必然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也不会进入学院派文学批评的范围,特别是今天的新媒体文学对当代文学批评提出的严峻挑战。^⑪那么,它们又该如何得到关注呢?这就是第二种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大众媒介批评。

大众媒介批评主要由快节奏的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批评组成。大众媒介批评具有大众性、快捷性、混杂性、广泛性等特征。^⑫它从近现代以来就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发展离不开媒介批评(报纸、刊物)。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印刷媒体发达,涌现了很多期刊、报纸,现代文学中的期刊、报纸批评就很发达。类似“读者来信”的媒介批评也经常出现,积极介入文学秩序之中。^⑬尽管这些批评未必都是大众的,有的也是同人性质的,但媒介性体现充足,使得同人文学有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比如《新青年》《语丝》等。在20世纪后期和新世纪,电子媒介发达,除了传统的纸媒《人民日报》等报纸,新世纪以来形成的网络批评,使得大众媒介批评迅速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尽管其中问题不少。^⑭网络批评是大众媒介批评的最重要领域,比如大型的门户网站以及大型文学类网站如起点、榕树下等,都有较稳定的书评人群体,能很快地进行文学批评的再生产与循环。大众媒介批评的特征就是短小,比如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短小也意味着数量大、范围广,可谓是铺天盖地。这里面既有评论员文章的权威性,也有不具名评论,并迅速形成社会效应。大众媒介批评主体往往是驳杂的,身份、立场、教育程度非常不同,这也使得大众媒介批评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众声喧哗。

无论是学院派批评还是大众媒介批评,它们都并非铁板一块,都有不同的声音。大众媒介批评除了公众批评外,还有官方主流批评,也有民间批评,或者同人批评,乃至个人情绪化批评。同样,学院派的小众批评也有官方主流的影响,建构主流文学史叙事,也有学者个性的体现。

二、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价值诉求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小众批评,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大众批评,显然都是受制于复杂的价值考量的。这是文学批评话语实践的第二个方面。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传统、现代、后现代思想碰撞,中西之间交流加深但矛盾不断,文学与现实(科技、商业等)之间问题层出不穷,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也就日益强烈了。

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其实就是文学本身的诉求,这也是文学批评的本体价值,即是文学批评,即说出文学作

品的高下、好坏、优劣、美丑来。但是,其他价值诉求又不断地影响、干涉、制约文学批评,这就是功能价值,即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对文学有评价的功能,即价值评判(广义批评)的功能。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一旦做出就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后续效应,从而使本体价值与功能价值无法截然分开。但为了论述上的方便,这里还是分开来讨论。

文学批评的本体价值诉求是文学的,很多文论家关注文学观念的纯杂,或者文学与非文学之差异以及“文学性”等问题,偏重文学哲学,而并非是文学批评。本文关注的是批评维度,其中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文学(作品)之于文学家创作之关系,即确定某部文本在写作者写作序列中的位置。文学是人学,文如其人,写作必然是作者生命的外化。文学批评者要确定某部文本在某一写作者写作序列中的位置,其前提必须是真正的写,即独立的、个性的、自由的、审美的、生命的写作,能够超越于一时一地的局限而具有人民性、人类性、文化性,就像拉美作家保罗·柯艾略所说的“和自己的灵魂交流”。^⑮真正的写作就是开拓人性的丰富性,见出真实的自己,以此彰显文学批评的人文学意义。在此前提下,确定某部文本在写作者写作序列中的位置就是看其是自我超越的创新之作,还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作,或者同水平重复之作,以及江郎才尽的末流之作。文学批评者必须要熟悉作者的文学写作实践并厘定文本在写作者的全部写作中的序列。比如陈涌对陈忠实《白鹿原》的分析就对陈忠实此前的作品如《蓝袍先生》《初夏》等进行分析,从而确定《白鹿原》的位置。^⑯此外,那种受制于各种非写作意图(如功利性意图)的写作,就偏离了文学,偏离了作家个性,也就无所谓文本序列了。

第二,文学(作品)之于文学史发展之关系,即确定某部文本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进而确定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真正的文学史必须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体现着人类的精神超越与人性的自我丰富,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意义是看这部文本在文学史上是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产生了思想的价值,是否体现了新的审美模式,是否开拓了新的写作主题,是否有更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是否表现了新的特色,等等。在古代文学中,比如《金瓶梅》与《红楼梦》,《金瓶梅》在很多方面都对《红楼梦》有影响,但《红楼梦》又超越了《金瓶梅》。^⑰在当代文学,程光炜对王安忆的文学史批评就体现了这一点。^⑱但是,确定某部文本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然而,时代的浮躁往往使文学批评简单武断地确定该文本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意义,这样的判断是不严谨的。

文学批评的本体价值诉求是面向当下的,就写作者而言,写作者是否坚持人学、人文学立场进行文学的持续写作;也是面向历史的,就文学史而言,文学史是否体现了对人性的维护、推进和完善上,益于社会的持续进步,是否推进了文学的多元发展,比如新形式、新范式、新类型等。面向文学写作与面向文学史,是文学批评本体价值诉求最为核心的两点,这是批评的基本伦理。^⑲文学写作和文学史本身发挥着文学作为人学和人文学的重要价值。^⑳文学批评必须经由对文学写作的促进和对文学史的建构来实现“文学是人学”或者“文学批评是人文学”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本体价值诉求就是坚持文学作为人学、人文学的价值立场,去彰显人,特别是彰显特定历史中、特定社会中的人的基本价值、尊严、精神、情感。这不仅是历代写作者所坚持的,也是文学史本身所坚持的。

如果脱离了文学写作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就走向了非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非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并非确立文学的文本序列和文学史序列,而是有它自身的目的。这就是文学批评本体价值外的功能价值诉求,此不赘述。

三、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机制

当下对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总是被导向于强调文学批评能够对当代(写作与社会)产生意义。这其实是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传统。后现代的文学批评则全然不在乎这一点,比如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但是,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是经过非当下文本(或曰理论化的文本)的分析进入文化流通领域,与前面并不冲突。这就是话语实践的第三个方面,即话语机制,就是指价值的运作结构,就是文学批评这一话语形式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有怎样的结构安排。

文学批评话语机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批评如何介入写作,或者文学批评为谁而写?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读者应该是写作者,尤其对当代文学而言。在当代文学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写作者,因为他们还健在,还保持着文学的可延伸性,即不断产生新文本。当代文学批评应该面向写作者,为写作者而写——介入写作,为作者摇旗呐喊,同时也使写作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写作。^㉑

但是,以下情况并不鲜见,就是写作者对文学批评的不满或者不屑一顾,认为文学批评根本不能理解文学文本和自己,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在不断丧失。^㉒这是批评范式的古今转变的必然结果。文学批评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一体型(知音型),即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创作者与欣赏批评者是一体的,契合无间。二是客观

型(科学型)批评家用客观的、他者的眼光来审视文本,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三是主观型(体验—接受型)批评家由着自己的感觉、思路进行批评,极端者则不顾及文本实情,充满误读。一般说,文学批评总是起步于第三种,而逐渐过渡至第二种乃至第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与真正的写作一样,都是生命化、交往化的。文学批评要坚持自己的阅读体验,通过自己的细读,通过对写作者文本的通盘考虑,确定该文本的位置,以理服人。文学批评者与写作者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诤友、知音、知己的关系。今天的文学批评很少能够达到这样的状况。

文学批评介入写作需要高超的见识与能力。文学批评承担着对写作者的一种参考、促进和启示的作用。这需要很高超的文学批评水平,需要站在文学史乃至人类精神史的高度上进行分析。这也是介入文学发展的最为切实的路径。这一点无疑给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围绕写作者的批评所形成的是作家论和创作论,对作家而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好的文学批评能够促进写作者对自我的理解,从而为后续写作奠定基础。这种文学批评是“了解之同情”,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是心灵的对话和交流。

文学批评话语机制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如何介入社会,究竟能产生何种社会效应?文学是社会行为,不是写作者个体的行为,也不是某种小圈子的行为,它必然产生社会效应。文学批评话语必须面对这一任务。^{②3}法国文学家萨特就在其文学批评著作《什么是文学》中坚持文学的“介入性”。^{②4}但是,文学介入社会极为复杂,大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介入政治,即政治批评。政治批评不是政治化批评,不是打棍子、扣帽子、贴标签,划分敌我等。^{②5}介入政治是一种批判性,唤醒阶级意识和政治诉求,促进反抗、斗争、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等,莫不如此。^{②6}这是文学批评社会效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尤其在大变革、大转型时代,更需要这样的政治批评。^{②7}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实质上的,还是表面上的,这需要文学政治批评的介入。比如陆震对张平小说《抉择》的批评就属于比较合理的政治批评,认为作品并没有真正从政治上加以剖析,而是坚持了某种道德立场。^{②8}但是,政治批评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政治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使用不慎会事与愿违,因此需要作出极为审慎的考量。^{②9}

其二是介入道德(伦理),即道德批评。文学批评的介入道德就是以道德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弘扬正能量,注重亲情、人情等,歌颂真、善、美,塑造高大、光辉的人物形象,鞭挞假、恶、丑等。但是,道德批评往往流于说教、刻

板、简单化,真正的道德批评是严谨的。道德批评如果得力于那些比较开明的道德观念,就会形成强劲的社会效应,比如对男女平等的坚持,对自由、个性、公正、人文性、生态性的强调,也都能焕发文学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学者还区分了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认为伦理批评是历史主义的,道德批评是主观当下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相通性。^{③0}这说明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始终是文学批评社会效应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有利于揭示作品当中的道德动机和作品的道德效应。

其三是介入经济(商业、娱乐产业),即商业批评,就是间接推动文学的经济效益。文学有经济效益,比如哈利·波特系列所带来的产业效应,10年间高达千亿,可谓是很好的例子。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拍成电影、电视剧,改编成游戏,可以制作成主题公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衍生品等,文学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商业批评的介入。有些网络文学做得更为出色,比如盛大文学做得就比较成熟。^{③1}商业批评遵循的是商业、资本、技术逻辑,考察文本获得经济效益的成功经验与规律。当然,一味追求商业成功必然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内涵,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让渡了长期的道德文化效益,这一点也必须加以警惕。^{③2}

其四是介入审美,即审美批评,就是梳理并重塑当代中国的审美趣味,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于当下文学实践极为复杂,往往受到政治、道德、经济(商业、消费、娱乐)的干扰,新兴文学更多的是娱乐化、休闲化的,泛娱乐化明显,^{③3}审美意义并不充分或明朗。因此,通过审美批评不仅可以确立中国当代社会的审美趣味谱系,还能将经过历史筛选的有价值的审美趣味凝结为永恒的经典审美趣味。这就是文学审美教育体系中的经典谱系。美国文论家布鲁姆一直坚持“正典”理论,以补救文化研究之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失,尽管有些悲情和乌托邦,但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③4}有学者曾提到文学教育体系应该强化审美意义,是值得思考的。^{③5}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体系中,以阅读、体验为特征的审美教育不应弱化。

其五是介入文化,即文化批评,是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化身份的一种体现。当前文学批评处于全球化之中,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建设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任何文学都可能会引发文化的解读。作为人文学,文学批评通过批评而抵达人文学的高度。文化批评能够纠正文学过于功利化、单一化、片面化的倾向,从而将文学放置在民族性、人类性、世界性的平台上加以考量。^{③6}文化批评中所坚持的人性立场,“昭示一种人性的存在”,^{③7}对亲情、家庭、道义的强调,对色情、血腥、暴力的回避,对自由、平等、善意的追求,都应该成为文

学创作的共同价值。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归宿。

今天,文学批评的介入社会是空前迫切的。今天涌现的大量的庸俗化的文学文本已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文学批评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代文学批评通过自己的实践对介入社会,从而参与社会进程,使得社会发展更加良性、健康、有序。

四、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力量

作为被设计、被建构的话语机制,介入写作与介入社会无疑在整体上决定了文学批评对文学与社会的重要意义。问题在于,这一话语机制如何使得文学批评真正实现介入写作和介入社会,这就是话语实践的第四个方面——话语力量。

最直接的是物质性力量,就是行政、法律、经济力量。它们也是泛化的文学批评,话语性最少。今天面对过分庸俗化的文学现实,行政力量表现明显,比如新闻广电总局颁发的“限娱令”等,规定各大卫视对娱乐性节目的限制,或者针对某种题材一窝蜂现象的限制,比如清宫戏等。比行政力量更规范的还有法律力量,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电影管理条例》等,从法律层面约束着文学创作。经济力量则对文学家进行直接投资,购买作品或者产业化比如(影视)改编等,都是在影响文学。

但是,行政、法律、经济力量并不是单一发挥作用的。行政、法律、经济力量的背后是更广泛的道德、政治、文化力量,而这些是社会学力量。所谓社会学力量就是借由舆论、话语、叙事等而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力量。如果文学艺术过分偏离、远离道德、政治、文化等力量,比如去中国化、崇洋媚外、娱乐化、庸俗化、戏说、职场斗争,就会引起道德、政治、文化力量的反弹和干预。有时候这种干预又会借助物质性力量类型,干脆利索,当然,其弊端就是过于一刀切,也有其问题。

由政治、道德、文化构成的文学—社会学力量固然发挥着重要意义,但文学—社会力量并不直接促进文学发展。文学发展更多的还是遵循艺术、审美的逻辑,这就是文学—人文学力量。这种力量是人文的力量,是具有生命性的、审美性的、精神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更加内在、平等、互动的形态。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走进文学内部,对写作形成促进作用。大致而言,有五点可以考虑:

其一,坚持艺术性、审美性、人文性、生命性的态度,就是将文学视为文学,坚持文学的立场,坚持“美和正义的信仰”。^⑩尽管文学一直在泛化,但泛化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审美性、人文性的消失。坚持文学批评的艺术性、审美性、人文性、生命性态度就是坚持文学批评的立场、文学的立场。

其二,文学批评的对象

的专精性。现在很多文学批评都是通论性的批评,很少针对某一写作者的文本而言的,继而做出深入的、细致的、亲切的交流。对文学的促进首先落实在写作者身上,如果对写作者都没影响,那如何促进文学发展呢?文学批评首先要选取那些重要的写作者、重要的文本、文学新现象新趋势作为对象。因为它们具有很好的带动和导向作用,也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对象,对此需要批评的见识与眼光。

其三,重视文本细读分析,从语言、情节、环境、结构、形象、情感、意蕴、文化精神等角度分析。从文本内部自然生发出阅读、批评感受,而不是主题先行、理论先行、概念先行。这样的批评只能让人特别是作者反感。

其四,知人论世与生命交往,就是对写作者要熟悉,通过与写作者的通信、交流、对话、批评、诘难等,了解其为人、经历、心路历程、写作动机、过程等。尽量找到文本中有价值的外部因素(作者、社会),作为批评的参照系,不至于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其五,批评家的职业意识。职业意识就是以批评作为自己的“志业”(但并非专业),类似于韦伯提出的“以学术为业”,^⑪而非将其视为谋生手段。职业意识与职业的尊严感是一体的。真正的批评家也是萨义德所坚持的真正的知识分子,^⑫为社会、人类而发声。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性、自豪感、使命意识,是史家之“秉笔直书”。

通过文学—人文学力量,文学批评形成的文本论、创作论、作家论,其本身具有很强的筛选、导向、预见力量,文学批评揭示写作者的经历、心理、人格,文本的来龙去脉,人物与故事的原型,文本艺术性的优劣高下,文本审美效果,前瞻性地指出写作者新的潜能和方向,重建批评家与作者的信任关系(契合无间),从而介入写作者的写作。

文学批评的三大力量都是话语力量,虽然它们表现不一。物质性力量最直接,是有限话语力量,没有更多的可诠释空间。社会学力量最广泛,是适度话语力量,在特定历史时代发生作用。人文学力量最持久,是无限话语力量,是可以不断被解读和诠释。文学批评的多重力量契合着文学批评介入写作与介入社会的话语机制,回应着文学批评话语的自体价值与功能价值诉求,从而在文学与社会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真正实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五、余论:理论的自我救赎何以可能?

理想而言,真正的文学批评自然是上述状态的文学批评,唯此才使得文学批评成为“活的”“有力的”文学批

评。这也为文学理论危机及现实化诉求(即面向文学)提供了积极的借鉴:理论难道不应如此吗?不应该是“活的”“有力的”理论吗?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只是分工和形态上的不同,本质上都从属于文学—社会学—人文学结构之中。文论也有学院派与大众媒介之分,也有本体价值诉求与功能价值诉求,也有介入写作与介入社会的话语机制,也表现为物质性力量、社会学力量与人文学力量。

本文之所以通过文学批评来回看文学理论,其原因在于一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观照文论,二是保持文学理论“下移”姿态,不想就文学理论而谈文学理论。在今天专业化、学科化的时代,跨学科、超学科的分析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曾几何时,文论与批评、文学关系密切,如今已经分道扬镳,文学委身商业化赚得钵满盆盈,批评还可以分得一杯羹,锦上添花,而理论则几近失语。这真是咄咄怪事。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下,回应开篇的问题“批评能拯救理论吗”?答案是不能,也是能。不能者是说文论与批评相互独立,各有各的任务,不能相互取代;能者是说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是文论可以借鉴的,文论可以参考下文学批评。

通过文学批评回看今天的文论危机,其实文论的危机实质是“身份”危机。余虹曾指明文论的“寄生性”,借以开启文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④然而这样的愿望大体还是落空了。在西方化、学科化、商业化、资本化、意识形态化的反复挤压下,文论的寄生性非但愈演愈烈,而其开放性与多元性也宣告失败。在历史上,文论本来上可以抵达哲学层次,中可以抵达文学层次,下可以抵达生活层次。可是今天的文论只能在哲学的指导下进行思考,对文学创作的隔膜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也都不会关注除了学术之外的生活的危机与苦难。至此,文论完成了真空化的褪变。

但是,用批评拯救理论并非将理论批评化,^⑤遽然让渡理论自身价值而委身批评,而是取长补短,找到人文学的共识要素,以补救文论因袭空疏晦涩之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论除了可以看看批评,还可以看看哲学,注重文学理论的哲学内涵;文论也可以思考人的问题;还可以看看思想,注重文学理论的思想价值,文论也可以思考民族命运问题;还可以看看文化,注重文学理论的文化精神,文论也可以思考自身与传统的生命关系问题,等等。其实,归根到底,任何拯救都是自我拯救而已,真正拯救文学理论的也只是文学理论自己。

作为在文化与历史中生成的文论,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或者一种学科建制,或者文化传统,也是一种生生

不息的饱含思想的话语实践。文论在今天的确实需要思考由全球化所激发并置身其中的身份问题与共同体问题。文学理论需要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跨学科身份(融合中西古今)、人文学立场(致力于个性、人性的丰富与完善)与思想的话语实践(介入文学、社会)。文论最终都是指向着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的丰富性、可能性与超越性。在这条道路上,文论不仅不会终结,而且将来日方长。

注:

- ①高建平《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 ②时胜勋《文学批评的现实性诉求及其困境》,《文艺评论》2016年第1期。
- ③近年来,文学批评依然问题多多,比如“文学批评面对这样日新月异又不断放大的文学对象,时有捉襟见肘的不足”。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182页。
- ④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 ⑤布赖斯勒《文学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 ⑥杨守森《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文史哲》2006年第1期。
- ⑦白烨《文学批评的新境遇与新挑战》,《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 ⑧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 ⑨郜元宝《批评五嗑》,《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 ⑩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 ⑪欧阳友权《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⑫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 ⑬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 ⑭谭德晶《批评的狂欢——网络批评“广场”辨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 ⑮何映宇《真正的写作,需要让自己赤裸》,《新民周刊》2015年第14期。
- ⑯陈涌《论陈忠实的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 ⑰朱星《〈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 ⑱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 ⑲张江《批评的伦理》,《求是学刊》2015年第5期。
- ⑳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 ㉑周坤《文学批评应推动作家的艺术创作》,《文艺报》2013年12月18日。

- ②陈国恩《文学批评的状态和批评家的角色》，《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 ③吴俊《文学批评、公共空间与社会正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 ④王岳川《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 ⑤曹霞《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学术界》2010年第5期。
- ⑥周志强《伪经验时代的文学政治批评——本雅明与寓言论批评》，《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 ⑦吴俊《文学的权利博弈：国家文学与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 ⑧陆震《“清官意识”与〈生死抉择〉》，《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7期。
- ⑨姚楠《政治批评：风平浪不静——简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中的政治批评》，《文艺评论》2003年第4期。
- 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 ⑪陈菁霞《盛大文学产业链》，《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
- ⑫刘新少《网络文学产业驱动与艺术审美的矛盾》，《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2期。
- ⑬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 ⑭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 ⑮祝海模《魂兮归来——论高校文学教育体系的拓展与改建》，《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4期。
- ⑯贾磊磊《建构艺术批评的文化标准》，《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
- ⑰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 ⑱陈国恩《文学批评的状态和批评家的角色》，《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 ⑲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 ⑳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 ㉑余虹《文学理论的寄生性与学理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 ㉒赖大仁《文学理论批评化：趋势与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青末)

Discours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Literary Theory

Shi Shengxun

Abstract: At the time of the crisis of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as an alternative, literary criticism has been given more time missions today. Can it save the theory? Before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make a new analysi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criticism is a discourse practice. The discourse pattern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are characterized by academic criticism and mass media criticism. They have potential value appeals behind them, namely, ontological value appeal and functional value appeal. They designed the discourse mechanism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op level, that is, to intervene in writing and society.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discourse mechanism, the material force, sociological force and humanistic for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have done their part, thus completing the overall process of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practice. Through this complex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practice, literary criticism becomes a “living” and “powerfu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is regard, it is not unrealistic to save theory by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may use this discourse practice to observe its own crisis, reflect on itself, and realize the self-salvation of theo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crisis; discourse practice; discourse mechanism; to save theory